

转型时期
的中国社会丛书

转型

时期

中国社会教育

刘精明等◎著

ZHUANXINGSHIQI
ZHONGGUOSHEHUIJIAOYU

辽宁教育出版社

转型时期
的中国社会丛书

转型

时期

中国社会教育

刘精明等◎著

ZHUANXINGSHI
ZHONGGUOSHEHUIJIAOY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教育 / 刘精明等著.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4.12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丛书)

ISBN 7-5382-7383-2

I. 转… II. 刘… III. 社会教育 - 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G7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6628 号

策划: 龙 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字数: 242 千字 印张: 12.125 插页: 4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国玉 栗田平 徐 悦 技术编辑: 袁启江 代剑萍

责任校对: 马 慧 薛振威 李 霞 美术编辑: 吴光前

整体装帧设计: 耀午书装

定 价: 28.00 元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丛书”总序

对于197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社会学家通常用“社会转型”的概念加以概括。什么是社会转型呢？就多数中国大陆社会学家的理解，就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变等等，在中国的场景下还特别指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

其实，如果回顾自孔德以来的社会学全部学说的历史，诸多的社会学大师们讨论的重点问题几乎都涉及了“社会转型”。譬如，孔德所说的人类知识与社会发展的三阶段，就是探讨社会如何从他所谓的神学的、崇尚武力的阶段转入实证的、信奉科学的、工业秩序的阶段。斯宾塞则根据社会组织结构的特点，将社会区分为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他认为军事社会是强制性的社会，公民的意志和生活受到政府的统治和制约，而工业社会是建立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公民是独立的、自由的。腾尼斯用“公社”与“社会”来表明他关于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类型”的思想，公社是指基于血缘纽带的、有感情的、有密切私人关系的人类共同生活，而他所谓的“社会”则是指，基于人类理智思考的、有利益关系的、建立了管理规范的人类共同生活。杜尔凯姆所说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前者指传统社会的组织形态，后者指现代工业社会的组织形态。至于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比斯特的“大趋势”等，则更是对于当代社会转型所作的诠释。总之，社会学家们试图阐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是什么，社会的类型是怎样区分的，社会为什么发生转型、社会是怎样转型的，以及社会转型的后果是什么。

说到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国近代化与现代化的最初的、比较成规模的努力大致可以从“洋务运动”算起，到今天也有近150年的历史了。当然，要想推动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传统中华帝国转型，就好比要启动一列满载重负的火车，在起始的阶段，其困难之巨大是可想而知的。后来，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想要在不彻底变革旧政权的前提下实现社会转型是没有可能了，孙中山先生在试图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进言而遭到拒绝以后，终于下决心发动革命，以激进的方式推进社会转型。辛亥革命表面上建立了现代的“共和式”政治体制，但实际的政治游戏还是“帝制式”的，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失败后不久，全国便陷入四分五裂的地方割据和军阀混战，此后，内战和外敌入侵，都使得中国社会转型的步伐一再拖延。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代年轻的精英式领导人，再次试图进行中国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社会转型实验。然而，“大跃进”失败以后，由于诸多的政治变故，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渐渐失去了对于中国现代化和工业化实验的兴趣，而代之以“阶级斗争”的实验。于是，中央的政策就一步步偏离了正常的现代化建设轨道。在“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时间里，非但没有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反而出现逆现代化的潮流而进，比如，非但不推进城市化，反而让千百万城市居民迁移到农村，非但不建设现代的职业分工体系，反而恢复“亦工亦农”的自然经济。虽然周恩来总理在1975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重提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是，在当时动乱的年代里，实际上，现代化的进程几乎是完全停顿了。直到1979年底，在邓小平具有改革思路的领导人重新确立了发展目标以后，中国朝向现代化的转型才又重新启动。

从1979年开始的经济与社会改革，是150年来中华民族朝向现代化社会努力成绩斐然的一段时间，迄今已经有26年历史了。在这26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超过7%的速度持续增长，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在这一段时间里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几乎超过了过去一百年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这一段时间也是

中国社会结构朝向现代化结构转型最为迅速的时期，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从农业向制造业的转型，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型，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均发生巨大变化，其变化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孙中山先生曾经感叹中国人的不觉醒，严复曾经感叹中国人的守旧、不变化，鲁迅曾经感叹中国人的麻木，然而，曾几何时，中国人变成了一个乐于接受外来事物的、接受变革的民族，其接受社会变化的程度超过了其他很多民族，“改革”几乎成为一种“信仰”，为人们所广泛接受。

在这一阶段，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容众多，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也是极为深刻的，即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变化。计划体制的本质是政府包办一切——几乎所有资源的配置都是由政府完成的，比如，改革以前的分配工作、分配房屋、票证制度等，而新的市场体制的核心是由“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今日中国，与改革前相比，人们的生活真的发生了重大变迁。上学是自己考试取得的，而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是推荐或单位分配的名额，工作是自己找的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是服从分配，房子是自己分期付款购得的，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是由单位领导或“房管处”安排的，商品是自己到市场上挑选的，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等着从单位或街道拿到购买商品的票证。

市场的转型也引发了多方面体制的变迁。比如，劳动力流动，引发了城乡关系的变化，中国进入了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再比如，自由就业制度引发了工作方式和收入分配体制的变迁。城市单位体制的变化引发了社会保障体制的巨大变迁。仅仅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里就发生了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四大体制的变迁，即城市住房体制的变迁、城市医疗保障体制的改革、城市养老体制的改革和城市就业体制的改革。

社会学历来认为，社会的变革需要循序渐进，如果社会变化速度太快也会引发问题。26年来的巨大变迁，当然也引发了众多的不协调问题。不仅社会的各个构成部分之间有协调的问题，就是个人对于社会的变化也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本丛书就是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发现、分析、探讨和解决社会转型期的不协调

问题。所谓社会学的角度，首先是指采用了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其次是指一种综合的角度或社会整体的角度，即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部分的变化不会是单独的，所以要考虑整体的利益，要注意协调社会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社会学的角度也可以说是“社会效益”的角度，即不是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政治效益，而是追求社会的整体效益。

本丛书仅仅由四本书构成，当然不可能全面探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问题，只能是择其要者而述之。四本书的逻辑是这样，两本是讨论总体型问题的：一本分析人口问题，另一本分析社会结构或社会分层问题。两本是讨论具体问题的：一本讨论教育问题，另一本讨论贫困和救助问题。首都经贸大学黄荣清教授的《转型时期中国社会人口》从多种角度剖析了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中国人口所产生的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对策。笔者的《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对于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人群进行剖析。两本探讨具体问题的，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刘精明副教授的《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教育》，分析的是我国教育制度方面的问题，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洪大用教授的《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救助》，偏重于分析中国的弱势群体、贫困人口，并试图提出减轻贫困的对策。

今年春天，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刘国玉总编、李忠孝编辑专程到北京来，约我主编一套丛书，反映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剖析社会问题、提出社会对策。承蒙他们的盛情邀请，笔者特邀了学界的三位新秀，均为社会学界颇具实力的学者，经过辛勤耕耘，终于成就了这样一套丛书。笔者谨代表其他三位作者以此微薄之礼奉献于生活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的广大读者。

李 强
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2004年12月

前言

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对于国家、民族之强盛的重要意义已是不言而喻。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教育变革潮流，接二连三地涌起。我国教育变革从 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算起，至今已积累了将近 30 年的历史经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教育制度体系。这一时期，我国教育变革区别于其他国家教育的一个特点是，它一直伴随着中国社会内部的急剧变迁和社会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现代化过程和社会体制改革的三重变奏，强烈地引起了教育系统内部的资源和机会条件的变化，并深刻地影响着这些资源和机会的分配方式。在这种背景下研究教育发展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关系，探讨这一重大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教育问题，对于正在逐步完善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教育体系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也许社会学学科对于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通过揭示社会发展中的种种不平衡关系，通过强调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多重矛盾与问题，从学理研究和政策实践的角度增进和加深着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从而促使社会政策的制定朝着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方向推进，并最终在客观上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从整个社会学的发展历史来看，任何一种哪怕是最激进的社会学批判，都无不向往着一个稳定、繁荣而和谐的人类社会；任何一种哪怕是最为悲观的社会学观点，也都无不以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为参照。

同样，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转型期的教育问题，一项

严肃的研究和探索，也终将与整个社会的秩序结构密切关联。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教育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其核心仍然是整个社会学界最为关心的公平与平等问题。这样，教育平等或教育公平也就仍然与一个社会的基本秩序相关联。

在社会分层研究中，一种社会秩序可以表述为基本的阶级阶层关系和阶层间互动行为方式，社会秩序的紧张也即描述着阶层间关系的不平衡变动。这其中，一个基本的社会学研究主题是：任何社会统治秩序的维持都要处理一系列的社会阶层结构关系问题，即，社会上层如何将已有的地位优势保持下来，并成功地应付来自下层精英的挑战和威胁。社会历史经验表明，通过教育来吸纳下层精英，并通过教育来再制一种已存的社会分层结构，都往往能较好地回应上述社会秩序中的主题。从这一思考角度来看，也许最初西方社会以国家力量的形式来主导教育领域的发展，其基本目的并非是对普及民众教育的呼声的回应，甚至这一直都不是它的主要目标。正如新韦伯主义的两个重要代表人物柯林斯和阿切尔在讨论现代资本主义教育体系(modern education system)的产生和发展时所指出的，现代教育首先是在不同文化群体的教育要求相互冲突和对立的情况下产生的。国家为缓和下层精英对统治上层的僭越性威胁，往往主动从社会下层中吸纳和同化一定的优秀分子，以瓦解下层社会中可能存在的危险，并使之为现存社会秩序服务；而特权阶层为维持自身的地位优势，也会相应地建构出形式多样的教育分类体系。

与社会资源的“生存—地位”特性、以及“社会排斥”和“社会团结”两种并行的资源分配机制相关联的是，教育本身的“生存—地位”两种取向的质性区分。这种分类方式，也正是在回应社会秩序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两种教育实践方式。“生

存一地位”教育的类属化，虽然主要是社会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相互冲突、协调与力量平衡的结果，但也无不与国家作为一种独立的主体性力量来干预这种社会阶层关系相关联。工业革命、技术发展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提高，同时也意味着对社会民众的普遍性生存技能要求的提高。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首先回应着这一生产、技术领域的发展需求，同时也意味着确保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利的规则开始普遍流行起来。从那时起，国家在教育领域中就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维护民众之生存教育权利的角色。生存教育作为“公共教育利益”，已构成国家利益的一个基本方面，它的要求总是体现在总体性的国家战略规划之中。这一保障民众基本生存所需的教育权利的资源分配方式，无疑极大程度地缓解和调和了优势阶层对教育资源、教育机会的垄断和排斥性占有所带来的内在性社会阶层冲突。

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教育实践都表明，随着教育的扩展，在初等教育、甚至中等教育阶段上的教育不平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如特雷曼等人对31个国家教育发展的比较研究。本书第四章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0.95%抽样资料所测算的教育发展结果也表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特别是改革以来的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人口中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到1982年出生组时，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十年左右。与此同时，随着教育的扩展，性别不平等在1980年以后的出生人群中基本得到消除，区域内部的教育不平等和年龄组内部的教育不平等程度迅速递减。笔者本人的一些研究还曾证明，家庭背景（父代的文化资本和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在教育扩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较为明确的下降趋势，初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社会阶层差异也早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基本消失了。

但是，即使是这种由国家所主导的教育平等的推进过程，也仍然没有对由城、乡体制的分割所造成的教育不平等有多少实质性的触及；同时教育的区域性发展差异，特别是西部地区与其他区域的差异，截至“五普”调查当期，也没有出现多少缓和的趋势。这自然不仅反映了我国社会中存在的城乡、区域等方面的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同时也反映了国家在教育资源投入和教育的组织实施方式上，曾经存在着（并且一直尚未完全扭转）较为严重的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取向。然而，无论如何，教育发展的成就，仍然毋庸置疑地标志着我国生存教育领域中的教育平等在迅速推进。

在生存教育领域率先实现一定程度的教育平等，似乎是大多数国家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更多的教育与社会分层研究则表明，较低教育阶段的平等逐渐实现的同时，较高阶段的教育获得的不平等仍然最大限度地维持着。当教育获得在“量”的方面逐渐缩小差距的同时，教育领域中更为根深蒂固的“地位教育”的不平等，却丝毫没有任何削减的迹象。相反，它随着教育的扩展反而在不断地加固、维持和扩大着自身的不平等边界。在本书第七、八章，我们着重讨论了高中教育分流与高等教育扩展过程中的地位教育与社会阶层背景之间的关联。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针对具有典型的“地位”取向意义的重点高中教育和大学本科教育机会，社会阶层之间的排斥性竞争显得十分明确而激烈。地位教育本身之间的相互关联也显露了出来，个体在高中阶段获得过的重点学校教育，既得益于其优势的社会阶层背景，同时也可能会为获得地位取向的高等教育作好准备。特别是高等教育扩展过程中，阶层之间的相对优势差异还非常明确而强烈地在扩大（这甚至也体现在大学专科教育机会的获得方面）。同时，地位教育本身之间的相互关联也强烈地显露了出来，个体在高中阶段获得过的重点学校教育，

既得益于其优势的社会阶层背景，同时也为获得地位取向的高等教育作好了准备。

然而我们也看到，即使是地位教育领域中的社会阶层竞争，其情势又是十分复杂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体力劳动者的子代，似乎在一个以技术选择为主要特征（以学业成绩为标准）的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中，有着较为独特的机会优势。这种情形的存在，既表明一个开放社会中可能存在的“地位崛起”机制，同时也说明，用于教育竞争的各类社会资本并未完全地依照一种等级划分的阶层界限来分割——对此，本书第六章也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本书第九章“制度、文化与升学主义”，对与教育公平息息相关的“升学主义”行为的成因和运作方式，从制度主义的分析角度进行了一定阐释，并以个案研究方式加以分析和论证。第十章“民办教育与教育公平”，是研究者刚刚开启的一个研究主题，其中还有许多问题将在进一步的探索过程中加以深入展开和分析。

本书是一项合作研究成果，第一至六章和第八章由笔者完成，第七、九、十章作者分别为张丽、杨志勇和杨江华。

此外，本研究是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的整体规划研究项目中的一个部分，笔者作为本中心的专职研究人员，全书研究在物质上和时间上都得到了中心的支持。

刘精明

于北京西郊清耘居

2004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社会资源特性与社会平等策略 /1	
一、生存资源与地位资源	2
二、生存资源及其不平等底线	3
三、地位资源与自由主义、冲突论的社会平等观	5
四、生存资源的社会保障与资源获取能力的公平培养： 关于平等的一个理解	12
□第二章 社会分层秩序与教育选择 /16	
一、社会排斥与社会团结	16
二、生存教育与地位教育	24
三、教育选择方式	36
□第三章 社会变迁中的教育选择形式 /57	
一、社会经济、政治过程与教育选择	57
二、各历史时期的教育选择特征	63
三、特殊历史时期的教育选择后果	86
□第四章 我国教育水平的发展及其结构性差异 /95	
一、我国教育发展的基本状况及主要结构性差异	95
二、结构性差异的模型估计	107
三、教育发展时序与性别、城乡差异的变化	112
四、各区域教育发展的时序性差异比较	115

五、教育扩展与教育不平等	118
□第五章 社会阶层位置与教育机会 /130	
一、文献回顾	130
二、社会阶层位置与教育机会	137
三、各职业阶层就业后的职业培训机会	147
□第六章 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 /150	
一、研究问题	150
二、不同职业阶层的各类资本特征	152
三、家庭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163
□第七章 社会阶层背景与高中分流教育 /169	
一、我国高中教育发展的基本状况	169
二、选择谁? 相关问题及讨论	172
三、研究框架	179
四、实证研究: 变量与数据	186
五、重点高中教育机会的回归分析	190
六、高中学业成绩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196
七、阶层背景与学业成就: 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	209
□第八章 社会阶层背景与高等教育机会 /219	
一、改革以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219
二、研究框架	224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227
四、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中的阶层界限	232
五、各阶层相对机会优势的变化	240
□第九章 制度、文化与升学主义 /248	
一、“升学主义”问题的研究回顾	249
二、制度与制度分析	256
三、“升学主义”的制度分析	261
四、个案研究	276
□第十章 民办教育与教育公平 /299	
一、民办教育的界定	299

二、改革开放后我国民办教育发展历程及现状	302
三、民办教育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306
四、简要结论与讨论	330
□附录一 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测算数据表 /333	
□附录二 第七章调查问卷中的有关内容 /340	
□参考文献 /344	

第一章 社会资源特性与社会平等策略

公平、正义或平等，很早就引起了思想家们的注意。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朴素的平等、正义观念，这些观念甚至一直到今天还为人们所沿用，将其作为这些范畴的基本含义。苏格拉底把人们对贪欲的自我控制称作“公平”，柏拉图把人们在各自的分工位置上安分守己、各就各业所形成的秩序叫作“正义”，而亚里士多德用数量和比例来规定平等的含义，他所提出的所得资源数量上相等的“数量平等”观、按照个人“真价值”来分配与之相称资源的“比例平等”观，无疑是今天关于“绝对平等”、“相对平等”概念的直接来源。同时这些思想家也将公平与社会规则或法律的遵守联系起来，^①从中可以看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初形式。到了近代，对中世纪神学的反叛和理性精神的倡导，首先产生了基于自然法理论的“平等”观念，认为平等、自由是天赋人权，是人的基本权利并成为后来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国基石。现代社会思想中，对于平等、公平、正义的理解更为具体和丰富，更为重要的是，对平等的研究与一些在价值上同样重要的范畴联系起来，平等与自由（弗里德曼，1950，1979；哈耶克，1960）、公平与权利（达伦多夫，1992）、平等与社会结构（吉登斯，1999），正

^① 参见吴忠民：《关于公正研究历程》，《东岳论丛》，2001年第2期。

义与社会制度（罗尔斯，1971）、平等与效率（奥肯，1977，J.E·米德，1992）等等，这些范畴之间的关系，都在衮衮现代诸公中都有着十分广泛而深刻的探讨。

一、生存资源与地位资源

社会平等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研究主题。社会平等的一般涵义在于社会资源或财富的分布状态以及人们对这种分布的主观认知和评价（李强，1993），因此，如果对资源或财富的性质加以进一步的分析，也许会有助于我们对平等或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资源的意义首先是相对于人类需要而言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关于需要的区分也许会有助于我们对资源性质的理解。凯恩斯说，“……人类的需要可能是没有边际的，但大体能分作两种——一种是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感到必不可缺的绝对需要，另一种是相对意义上的，能使我们超过他人、感到优越自豪的那一类需求。第二种需要，即满足人的优越感的需要，很可能永无止境，……但绝对的需要不是这样。”^①凯恩斯关于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的这种区分，把我们引入了相对性资源与绝对性资源这一基本划分的大门。社会资源的绝对性，意指这种资源对个体的生存以及维持个体在社会中最基本的人的尊严（即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来讲是必需的，因而在任何一种社会分配过程中就存

^① J. M·凯恩斯：《我们子孙的经济前景》，见《劝导文集》，《凯恩斯全集》，第九卷第326页（London，McMillan），此处转引自贝尔，1989，第22页。